

转变不是开始了吗？

(1910 年 11 月 16 日 (29 日))

这一号的报纸¹已经排好版了，我们才收到彼得堡和莫斯科 11 月 12 日的报纸。尽管合法报刊上登的消息不多，但无疑从中还是可以看出：许多城市举行了大学生集会、示威和街头游行，要求废除死刑，发表反政府的演说。就连完全同十月党人唱一个调子的《俄罗斯新闻》²也报道说，在 11 月 11 日彼得堡的游行示威时，在涅瓦大街上聚集了不下 1 万人。这家报纸还报道说，在彼得堡区，“在民众文化馆附近有许多工人加入了游行队伍。在土奇科夫桥前游行队伍停了下来。警察怎么也阻止不了游行，人群唱着歌，打着旗，向瓦西里耶夫岛大街行进。只是在大学附近，警察才把人群驱散”。

不用说，警察和军队是按照真正俄国方式行动的。

对于这一次无可置疑的民主运动的高涨，我们将在下一号再作评论，但在这里我们不能不稍微谈谈各个党派对待这次游行示威的态度。《俄罗斯新闻》在 11 日刊登了一条假消息，说游行示威取消了；在 12 日又报道说，社会民主党并没有通过任何决定，而个别的社会民主党代表甚至表示反对，只有劳动派³在所通过的决议中认为不可能阻止游行示威。我们确信，这个败坏我们社会民主党代表声誉的消息是假的；这大概也是《俄罗斯新闻》恶意捏

造的，如同它昨天捏造说游行示威取消了一样。《莫斯科呼声报》⁴ 12 日报道说，“除了社会民主党，所有党派的代表都反对大学生上街游行”。

很明显，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和十月党的机关报在极力“回避事实”，它们被“游行示威是由塔夫利达宫操纵的”这种极端荒谬可笑的右派叫嚣吓坏了。

立宪民主党人⁵ 的行为很不体面，这是事实。《言语报》⁶ 在 11 日，即游行示威那一天，刊登了立宪民主党代表请求不要组织游行示威的呼吁书。无论是这篇呼吁书，还是《言语报》的社论，提出的理由实在卑鄙可耻：“不要玷污”哀悼的日子！“举行示威，把示威和悼念托尔斯泰联系在一起”——那就是表明“对神圣的悼念缺乏真诚的爱”⁷！以及诸如此类道地的十月党人的论调（参看《莫斯科呼声报》¹¹ 日那篇几乎字句都完全相同的社论）。

幸而立宪民主党人对民主运动施展的卑鄙伎俩没有成功。游行示威仍然举行了。警察当局的《俄国报》⁷ 继续把一切都归罪于立宪民主党人，竟然把他们的呼吁书都看成是“煽动”，而在杜马⁸ 中，用《莫斯科呼声报》的话来说，十月党人⁹ 和极右派（舒利金）却称赞立宪民主党人的功绩，认为他们是“游行示威的反对者”。

只要人们还在受立宪民主党人的领导，只要人们还没有本领对付立宪民主党人的背叛，俄国的解放运动事业就是没有希望的，——如果俄国革命的整个进程还没有教会人们认识这一点的话，那么就让人们从当前的政治事件中，从 11 月 11 日的游行示威的历史中去反复吸取教训吧。

民主运动高涨开始之时，也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开始干卑鄙勾当之日。

再谈一谈《莫斯科呼声报》上的一则消息,这则消息说,工人曾经建议大学生在 14 日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也许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因为今天(11 月 15 日(28 日))巴黎的报纸报道说,在圣彼得堡有 13 名总工会委员因企图组织工人示威而被捕。

载于 1910 年 11 月 16 日(29 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8 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
第 20 卷第 1—3 页

为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

(短评)

(1910 年 11 月 16 日〔29 日〕)

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就黑帮杜马第四次常会第一次会议写道：“本届杜马在今天彻底而坚决地背弃了人民情绪和民族意识。”这当然是针对黑帮分子和十月党人拒绝追悼第一届杜马主席穆罗姆采夫而讲的。

这句话再明显不过地表明，我国自由派对整个争取自由的斗争的看法，特别是对为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游行示威的看法，是极其虚伪的。

毫无疑问：由于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游行示威来反对沙皇政府，反对专制制度，反对黑帮杜马，这是必要的；这样的游行示威已经举行过了；参加游行示威的有各种不同的、最广泛的居民阶层，有各种不同的政党，从社会民主党直到立宪民主党、“进步派”¹⁰和波兰的十月党人（波兰代表联盟¹¹）。而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立宪民主党人对这次游行示威的评价千百次地表明，他们和民主派是多么不同，如果让他们来领导俄国的民主事业，或者哪怕只是让他们参与领导，对这个事业将会有多大的危害。

所有的民主派和所有的自由派当时都参加了而且也都应当参加为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因为在黑帮杜马的黑暗

制度下，这样的游行示威能够公开地、比较广泛地表达出对专制制度的抗议。沙皇专制政府拼命反对在俄国建立代表机构。当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用群众斗争的办法迫使专制政府不得不在俄国召开第一届议会时，专制政府就在召开议会的问题上弄虚作假，肆意歪曲。当人民的声音，民主派的声音在第一届杜马¹²中响起的时候，专制政府就对民主派，对人民加以嘲弄和侮辱。现在就连回忆一下民主派在第一届杜马中无力地提出的那些要求，也要遭到专制政府的追究（民主派在第一届杜马时期从杜马讲坛上提出的那些要求与 1905 年秋从公开的群众斗争浪潮建立起来的讲坛上提出的要求相比，要无力得多，贫乏得多，涉及面要窄得多，生命力要小得多）。

正因为如此，民主派和自由派过去才能够而且也应当取得一致的看法：利用一切可以提醒群众进行革命的机会，举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游行示威。但是，他们尽管在共同举行游行示威方面的看法一致，却不能不对民主派任务的评价，特别是对第一届杜马的历史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他们一着手进行这种评价，马上就表明了我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极端无知，在政治上的软弱和低能。

真没有想到，黑帮杜马‘在今天’即在 1910 年 10 月 15 日这一天才“彻底而坚决地背弃了”人民！这就是说，在此以前它并没有坚决地背弃人民。这就是说，参加追悼穆罗姆采夫，就消除了，或者说能够消除“背弃”“人民情绪”的现象，即消除我国某些反革命分子背弃民主派的现象。热中于民主派这一崇高称号的先生们，你们要知道，当你们这样提出问题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而不是别人在把游行示威的意义贬得最低最庸俗。《言语报》写道：“对第三届杜马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评价即使再低，那种认为它会拒绝履

行起码的义务,拒绝追悼这位如此辉煌卓越地开创了杜马〈!〉并使之神圣化了的人的想法,也是荒谬的。’真会奉承,原来穆罗姆采夫开创了‘杜马’第三届杜马,并使之神圣化了 立宪民主党人这句话无意中道出了痛苦的真相,这就是,俄国自由派和俄国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斗争和 1905 年底的起义,而‘开创了’整个反革命时期,特别是第三届杜马时期;并使之神圣化了。’《言语报》写道:“我们认为,一小撮政治捣乱分子是不能够压倒杜马中多数人的温文尔雅的声音的。’原来如此 过去和现在谈的都是‘温文尔雅’的问题,而不是反对专制制度的问题。现在提出的不是民主派同反革命“决裂”的问题,而是自由派同反革命联合的问题。自由派正在采取反革命的立场,它邀请反革命代表十月党人一同来追悼穆罗姆采夫,不是为了表示对专制制度的抗议,而是为了做到“温文尔雅”。穆罗姆采夫‘开创了’由沙皇召开的第一届所谓议会;并使之神圣化了”(竟有这样令人作呕的话!)十月党人先生们,你们坐在由沙皇召开的第三届所谓议会中,却拒绝履行这个“起码的义务”,岂不是‘粗暴无礼’吗?从这个很小的例子中,仅仅从立宪民主党正式机关报的这一论断中,可以异常清楚地看出,我国自由派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腐朽极了。他们的路线就是劝说专制政府、黑帮地主及其同盟者十月党人,而不是启发群众的民主主义意识。因此他们的下场就是永远做君主制度和封建主的奴隶,永远受到君主制度和封建主的蹂躏,这是这种资产阶级自由派在一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必然的下场。

如果立宪民主党的代表们对民主派的任务稍有了解,他们在第三届杜马中所关心的就不会是十月党人履行“起码的义务”的问题,而是面对人民举行游行示威的问题。那就不需要向主席呈递

声明（根据议事规则第 120 条规定，这种声明是否宣读要由主席来裁夺），而是要通过某种方式把问题提出来加以讨论。

如果立宪民主党的作家们对民主派的任务稍有了解，他们就不会去责备十月党人无礼，而会阐明第三届杜马的所作所为恰恰突出地表明了为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的意义，恰恰不是去讲“温文尔雅”这种庸俗的、市侩的废话，而是把问题提到对现行制度和各个政党的作用从政治上进行评价的高度。

但是为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不能不同时提出另一个问题，即关于第一届杜马的历史意义的问题。立宪民主党人把穆罗姆采夫捧成“民族英雄”，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们当时在杜马中占多数，他们那时指望成立立宪民主党内阁，指望用“和平的”办法取得自由，指望加强他们在民主派中间的领导权。以日尔金先生为代表的劳动派竟然也堕落到附和自由派的这种论调的地步，他们干脆把穆罗姆采夫当作各左翼政党的政治上的“教导者”来纪念。

立宪民主党人和劳动派对第一届杜马的这种评价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表明了俄国“社会”的政治觉悟水平极端低下。俄国“社会”既然赞扬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中的政治作用，他们就没有权利抱怨斯托雷平和第三届杜马，因为他们只配有这么一个政府。自由派在俄国解放运动中取得领导权，必然意味着运动软弱无力和野蛮的地主的统治无法排除。只是由于无产阶级摆脱了自由派，实行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才使革命一再取得胜利，并且能够使革命继续取得胜利。

第一届杜马时期就是在 12 月遭到失败的无产阶级为新的冲击聚集力量的时期。在 12 月以后低落下去的革命罢工这时又蓬勃

地高涨起来；继工人之后，农民也跟上来了（1906 年春的农民骚动席卷了欧俄 46% 的县份）士兵‘暴动’也更趋激烈。这时自由派资产阶级必须作出抉择：或者是帮助群众实行新的革命冲击，这样，就有可能战胜沙皇制度；或者是脱离革命，从而促使沙皇制度获得胜利。群众斗争又一次高涨，资产阶级又一次动摇，沙皇政府犹豫不决、伺机而动，——这就是第一届杜马时期的实质，这就是俄国历史上这个时期的阶级基础。

无论是操纵第一届杜马的政党立宪民主党，或者是该党的首领之一穆罗姆采夫，都表现出对政治形势的完全无知，都又一次背叛了民主派。他们背弃革命，谴责群众斗争，给群众斗争设置种种障碍，并且竭力利用沙皇政府的犹豫不决，拿革命来恐吓它，以革命名义要求进行交易（即成立立宪民主党内阁）。显然，这样的策略对民主派来说是一种背叛，对沙皇政府来说是一种软弱无力的、似乎是鼓吹‘立宪的’夸夸其谈。显然，沙皇政府一面‘玩弄’同立宪民主党人谈判的‘把戏’，一面为解散杜马、实行政变作准备，以便赢得时间来积聚力量。无产阶级和一部分农民在 1906 年春已经起来进行新的斗争，他们的过错或者说不幸就在于，他们斗争得不够坚决，他们的人数不够多。自由派在 1906 年春陶醉于玩弄立宪把戏和同特列波夫谈判，同时对那些唯一能够推翻特列波夫之流的人横加指责，并阻碍那些人的工作。

资产阶级的伪君子喜欢讲的一句名言是：对死者要么一言不发，要么称道几句（*de mortuis aut bene aut nihil*）。无产阶级需要了解政治活动家的真相，不管他们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因为⁸凡是真正配得上被称作政治活动家的人，即使他们的肉体已经死去，他们在政治上是不会死去的。关于穆罗姆采夫，讲些程式化

的谎言，就是危害无产阶级事业和民主事业，就是腐蚀群众的意识。而讲出关于立宪民主党人和那些让立宪民主党人来领导（和欺骗）自己的人的痛苦真相，就是纪念俄国第一次革命中伟大的事物，就是帮助第二次革命获得成功。

载于 1910 年 11 月 16 日(29 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8 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
第 20 卷第 4—9 页

两 个 世 界

(1910 年 11 月 16 日〔29 日〕)

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¹³的文章在各个报纸上已经发表了很多，这次代表大会的一切主要事件和斗争的各种曲折，大家都十分清楚。修正主义者同正统派斗争的表面现象和代表大会的一些戏剧性的插曲，过多地吸引了读者的注意，这对认清这场斗争的原则意义和认清分歧的思想政治根源是不利的。然而马格德堡的争论——主要围绕着巴登人投票赞成预算的问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材料，说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有两个思想世界和两种阶级倾向。投票赞成预算，只不过是这两个思想世界分歧的表现之一。这种分歧非常深刻，今后无疑还会由于更加严重、更加深刻和更加重要的原因而表现出来。现在，当大家都清楚地看到德国伟大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时候，必须把马格德堡的争论看成是一小部分军队在作战前的一次小检阅（因为关于投票赞成预算的问题只是社会民主党基本策略问题的一小部分）。

关于无产阶级大军各个部分怎样了解自己的任务的这次检阅，表明了什么呢？关于大军各个部分将如何行动的这次检阅，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想谈的问题。

我们先从一个局部的（初看起来是局部的）冲突说起。修正主义者的领袖弗兰克象一切巴登人一样，竭力强调说，冯·博德曼

大臣最初否认社会民主党同其他政党即资产阶级政党“平权”，后来似乎又收回了这种“侮辱”。倍倍尔在他的报告中曾就这个问题说道：

“……现代国家的大臣是现存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代表，而现代国家这个政治机构的目的，就是防止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进攻以保卫和支持现存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必要时还要通过暴力来保卫。如果这样的一位大臣说他不承认社会民主党有平权，那么从他的角度来看，他这样说是完全对的。”弗兰克打断倍倍尔的话喊道：“没有听说过！”倍倍尔接着回答他说：“我觉得这是十分自然的。”弗兰克又大叫：“没有听说过！”

弗兰克为什么这样激愤呢？因为他对资产阶级“法制”和资产阶级“平权”信服得五体投地，而不懂得这种法制的历史局限性，不了解事情一旦涉及保存资产阶级所有制这个基本的和主要的问题时，这全部法制就一定会而且必然会化为乌有。弗兰克满脑子小资产阶级的立宪幻想；所以他不懂得，即使在德国这样的国家，实行立宪制度也有历史条件性；他相信德国资产阶级的（更确切地说：资产阶级的封建的）宪法的绝对作用和绝对效力，所以当立宪大臣不愿承认他弗兰克这位奉公守法的议员的“平权”时，他从内心感到受了侮辱。弗兰克陶醉于这种法制，竟然忘记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是不可调和的，他不自觉地站到那些认为这种资产阶级法制永世长存、认为社会主义可以装在资产阶级法制框子里的人的立场上去了。

倍倍尔使问题摆脱了资产阶级民主派所固有的这种立宪幻想，把问题放到阶级斗争的实际基础上去。能否因为资产阶级制度的维护者不承认我们这些整个资产阶级制度的反对者有资产阶

级权利上的平等，就感到自己是“受了侮辱”呢？如果认为这样就能侮辱我，那就足以说明我的社会主义信念是多么的不坚定了！

倍倍尔还尽量利用明显的例子来使弗兰克理解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倍倍尔对弗兰克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¹⁴并不能‘侮辱’我们。我们当时是义愤填膺，满腔仇恨；如果那时我们有可能，我们就会象我们内心所希望的那样投入战斗，我们就会彻底粉碎我们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暴风雨般的赞许声——在速记记录中此处是这样记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成为我们事业的叛徒。”（对！但是我们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弗兰克说，立宪大臣不承认社会党人的平权，就是侮辱我。倍倍尔说，这种人否认平权，未必就是侮辱你，因为不久以前他践踏一切‘原则’；压迫着你，他维护资产阶级制度，本来就要压迫你，而且今后还会压迫你（倍倍尔并没有这样说，但是他明显地暗示了这一点。倍倍尔为什么这样慎重，只作了暗示，我们下面再谈）。如果我们有可能去压迫无产阶级的这些敌人而不去这样做，那我们就是叛徒。

有两个思想世界：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观点，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可以在资产阶级法制的基础上进行，但是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最后的结局，要导致面对面的搏斗，要面临最后的抉择。或者是‘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或者是自己被粉碎、被扼杀。另一方面是改良主义者、小资产者的观点，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虚有其表的立宪法制，不见残酷的阶级斗争，呆在某个小国的穷乡僻壤，忘记了当代伟大的历史问题。

改良主义者自以为是现实的政治家，是从事有益工作的人，是治国之才。让无产阶级保持这些幼稚的幻想，对资产阶级社会的

三宰者是有利的，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无情地粉碎这些幻想。倍倍尔说道，关于平权的言论是“毫无意义的空话”。倍倍尔在党代表大会全场笑声中说道：“谁能让整个社会主义党派上这些空话的当，谁就是治国之才，但是谁让自己去上当，那就根本不是什么治国之才。”这些话对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形形色色机会主义者，即让自己去上德国民族自由党人¹⁵的当、去上俄国立宪民主党人的当的那些人，真是切中要害。倍倍尔说道：“持否定态度的人往往比那些所谓从事有益工作的人所争得的要多得多。尖锐的批评、严正的反，总会产生好的结果，只要这种批评是公正的，而我们的批评无疑是公正的。”

机会主义者所说的有益工作，在许多情况下指的是替自由派工作，一般是替那些掌握政权、左右这个国家、社会和集体的活动的人工作。倍倍尔也直截了当地作出这种结论说：“在我们党内有不少执行民族自由党政策的民族自由党人。”他举出所谓的（倍倍尔用的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¹⁶ 颇有点名气的主编布洛赫作为例子。“在我们党内是不该有民族自由党人的地位的。”——倍倍尔在代表大会全场赞许声中直截了当地这样说。

请看《社会主义月刊》撰稿人的名单。他们全是国际机会主义的代表。他们对我们的取消派的行为赞不绝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宣布这个机关刊物的主编是民族自由党人，难道这不是说明有两个思想世界吗？

全世界的机会主义者都想采取同自由派结成联盟的政策，有的直截了当地公开宣布并实行这种政策，有的则鼓吹同自由派缔结的选举协定，支持自由派的口号，等等，并为此一再辩解。倍倍尔

一次又一次地彻底揭露了这种政策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了解和记住他的这些话。

“我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如果去同资产阶级政党建立联盟，那可以打赌：十之八九占便宜的不会是社会民主党人，而将是资产阶级政党，我们则要吃亏。这是政治规律，任何时候，只要右派和左派结成联盟，左派总是吃亏，右派总是占便宜……”

我如果同在原则上和我敌对的政党建立政治联盟，那我就必须根据需要进行改变我的策略即我的斗争方法，使它不会导致这个联盟的破裂。这样，我就再也不能展开无情的批评，再也不能进行原则的斗争，因为否则我就会触犯我的盟友；我只好默不作声，把许多事情掩盖起来，对那些无法辩解的事情进行辩解，对那些无法掩饰的事情进行掩饰。”

机会主义之所以是机会主义，就因为它为了一时的利益或从最眼前的、最表面的打算着眼而牺牲运动的根本利益。弗兰克在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巴登的大臣们“想吸收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一起共事！”

眼睛不应往上看，而应往下看，——在革命时期，我们曾对我们那些一再被立宪民主党许诺的种种前景所诱惑的机会主义者说过这样的话。倍倍尔在马格德堡所作的报告的结束语中针对弗兰克之流说道：“有些社会民主党人投票支持群众最希望彻底推翻的政府，这是群众所不理解的。我常常得到这样一种印象：我们有一部分领袖已经不再了解群众的疾苦了（暴风雨般的赞许声），他们毫不关心群众的境况。’而‘在德国各地，群众的积怨很深了’。”

倍倍尔在他的讲话的另一个地方说道：“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期，特别不能容忍腐败的妥协行为。阶级矛盾不是日趋缓和，而是日益尖锐。我们正在迎接非常非常严重的时期。这一届选举之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等着瞧吧。如果形势发展到在 1912 年爆发欧洲战争，那时你们就能看到，我们将会有什么遭遇，将会处在什么地位。想必不会是目前巴登人所处的地位。”

正当有些人沾沾自喜地满足于在德国已经习以为常的现状的时候，倍倍尔却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必将发生的变化上，而且建议党也这样做。倍倍尔在结束语中说道：“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只是前哨小冲突，小插曲。”主要的斗争还在后头。而从这个主要斗争的角度看，机会主义者的全部策略是最无气节和最近视的。

倍倍尔在谈到未来的斗争时，只是作了暗示。他一次也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德国就要发生革命，虽然他的意思肯定是这样的。倍倍尔指出，矛盾在尖锐化，普鲁士进行改革有困难，政府和统治阶级走投无路，民怨鼎沸，欧战间不容发，由于生活费用昂贵和资本家联合成托拉斯和卡特尔而造成了更加深重的经济压迫，等等，等等，——他的用意显然总是为了使党和群众了解革命斗争的不可避免。

倍倍尔为什么这样慎重，他为什么只作了一些启示？这是因为日益成熟的德国革命遇到了一种特别的、特殊的政治形势；这种形势不同于其他国家革命前的时代，因而要求无产阶级的领袖完成某种新的任务。这种特殊的革命前的形势的主要特点在于，即将发生的革命必然比过去的一切革命深刻得多，严酷得多，它必然会把更加广大的群众卷入更艰巨、更顽强、更持久的斗争中去。此外，这种革命前的形势的特点还在于，法制取得了极大的（和以前比较）统治地位，它已经变成了实施这种法制的人的绊脚石。这就是形势的特点，这就是任务的困难和新颖之处。

历史真会捉弄人，德国的统治阶级在 19 世纪下半叶建立了最强大的国家，加强了最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和建立最牢固的立宪法制的条件，而现在，他们十分明显地正在走向事情的反

面：为了保存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不得不毁掉他们的这种法制了。

近半个世纪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出色地利用了资产阶级的法制，建立了最优秀的无产阶级组织，创办了卓越的刊物，把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程度和团结精神提到了最高的水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现在，德国历史上的这半个世纪的时代，由于客观原因很快就不得不被另外一个时代所代替。利用资产阶级建立的法制的时代正在被伟大的革命战斗的时代所代替，并且这些革命战斗将在实质上摧毁全部资产阶级法制，摧毁整个资产阶级制度，而在形式上必将是资产阶级为摆脱它所建立的、如今成了它不能忍受的法制而进行垂死挣扎的开始（现在已经开始）。“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1894 年恩格斯用这句话说明了形势的特点和革命的无产阶级策略任务的特点¹⁷。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时时刻刻都要记住，它所面临的、必然会面临的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斗争，这场斗争将摧毁注定要灭亡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法制。党过去极好地利用了资产阶级的半个世纪的法制来反对资产阶级，现在，当敌人被自己的法制束缚住，不得不‘先开枪’；不得不破坏自己的法制的时候，党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斗争中的这种便利条件，放弃搏斗中的这种有利地位。

这就是现时德国革命前的形势的特点。这就是老倍倍尔如此慎重的原因。他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行将到来的伟大斗争上，他用自己的巨大天才、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威信的全部力量来抨击近视的、无气节的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不了解这场斗争的意义，他们不适合当这场革命斗争的领袖，看来他们在革命期间将不得不由领袖变为被领导者，否则就会被抛弃。

在马格德堡，人们曾经同这班领袖进行争论，谴责他们，向他们提出正式的最后通牒，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伟大革命队伍里的一切不可靠的软弱分子，这些人深受资产阶级法制的熏染，他们由于迷信这种法制，崇拜一个奴隶占有制时代即一个资产阶级统治时代的整个局限性而麻木不仁。德国无产阶级谴责了机会主义者，并以开除相警告，从而也就谴责了自己强大组织中的一切停滞不前、丧失信心、萎靡不振以及不能与垂死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心理决裂的人。先进阶级谴责了自己队伍中的不好的革命者，在踏上社会革命之路以前，最后一次检阅了自己的力量。

* * *

正当全世界所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在十分关注德国工人如何准备投入斗争、如何选择斗争时机、如何严密监视敌人并克服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弱点的时候，全世界的机会主义者却在幸灾乐祸，庆幸卢森堡和考茨基对当前时机的估计存在意见分歧，庆幸他们对象俄国革命中的 1 月 9 日那样一个转折点什么时候到来，是现在到来还是不是现在，是立即还是以后到来这个问题存在意见分歧。机会主义者在幸灾乐祸，他们既在《社会主义月刊》，又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马尔丁诺夫）、《生活》杂志、《复兴》杂志¹⁸等取消派的机关刊物上，也在《新时代》杂志¹⁹（马尔托夫）^①上大肆渲染这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意见分歧。马格德堡代表大会表明，全世界机会主义者的这些手法是无济于事的，德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并没有发生什么显著的作用。机会主义者幸灾乐祸得太早了。马格德堡代表大会通过了罗莎·卢森堡

^①在《新时代》杂志上，马尔托夫曾受到卡爾斯基同志的坚决驳斥。